

海外观察

另起炉灶打破旧秩序

刘洪

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就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时候,提出了美国“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佐利克等人所担心的是崛起的中国将如何看待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所以用“负责任”来约束中国。但这显然是一个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很不公平的秩序,对中国等国而言,挑战西方肯定不是上策,期待让步也更多属幻想,另起炉灶,就成了打破旧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

巴西福塔莱萨,由此成为另起炉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久前在这里举行的金砖国家(Brics)峰会上,金砖国家银行正式成立,初始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同时,创建应急储备安排机制,资金同样为1000亿美元。

尽管金砖国家事先声明,这两个机制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对后两者的补充。但显然,这更多属于外交辞令,新银行肯定对旧机构有补充,但它产生的根源,则是对旧秩序的不满。其中,金砖银行效仿的是世界银行,新应急储备对应的则是IMF。

可以说,当前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最集中表现在世行和IMF这两大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上。成立近70年来,两大机构一直为西方掌控,世行行长必然是美国人,IMF总裁非欧洲人不可。随着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两大机构的蜗牛式改革,已脱节于时代发展,让许多国家难以接受。

以中国为例,尽管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IMF的份额只有3.72%,排在美、日、德、法、英等国之后。尽管2010年IMF提出改革方案,中国所占份额提升至6.39%,但由于拥有唯一否决权的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改革方案已搁置四年,何时能落实无人知晓。更何况,即使美国批准,也并无可喜之处,中国在IMF的份额仍低于日本,更不合比例地小于美国,有何公平可言?

中国如此,新兴国家整体亦然。世界银行中,金砖国家加在一起只有13%的投票权,而美国一家就占15%;在IMF中,金砖国家表决权的总和不过11%,而美国拥有近17%。由此,在福塔莱萨,金砖国家领导人也对当前国际金融秩序表达了强烈不满,对IMF改革方案无法落实表示“失望和严重关切”,并警告“这对IMF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

西方也不是没认识到这一点。佐利克担任世行行长期间,前所未有地提拔林毅夫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随后也就任IMF副总裁,这都隐含着西方安抚中国之意。这两年还有不少新兴国家人才被吸收进两大机构,但最关键改革没有落实,一言半取显然不过是敷衍。

谁掌控金融秩序,谁就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也正是西方在改革问题上屡有承诺但却无法落实的根源所在。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西方要借助新兴国家的力量,因此对世行、IMF改革持相对开放态度,但随着危机的结束,改革动力即大为削弱,IMF改革受阻即是明显例子。

期待西方主动变革,显然更多是幻想,在现有秩序中抗争,则很容易被扣上“挑战现状”、“不负责任”的大帽子。于是,另起炉灶,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金砖银行顺势而出,新应急储备安排也水到渠成,由此,金砖国家开始协作打造新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尽管从目前的资金构成和影响力方面,金砖银行尚无法和世行相提并论,应急基金也与IMF的筹资能力有一个大差别,但这好歹是金砖国家的一个抓手,由此有了与西方博弈的筹码。如果世行IMF改革再不到位,新平台就可以继续扩大,最终成为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抗争的福塔莱萨体系。

跳出旧秩序的束缚,另起炉灶打造新的体系,将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新兴国家重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对西方而言,如果无动于衷,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旧机构权威性的不断丧失,最终失掉的是西方的影响力。佐利克就曾警告,时代已经不同了,国际金融秩序必须改革,不然损害的将是西方的整体利益。

海外聚焦

分析师“地板价”淘金美国楼市

本报记者 黄继汇 纽约报道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企业和家庭都受到巨大打击。在这场狂风暴雨似的危机中,有一小部分人却看到了百年不遇的投资良机。比如美国许多法拍屋的价格一度跌到了2007年高峰价格的50%,夸张的甚至有二折价。

李明(化名)是在华尔街一家大银行工作的金融分析师。金融危机后,他和圈里的好朋友发现美国许多地区法拍屋的价格便宜到了“离谱的地步”,于是他和合作伙伴合伙涉足法拍屋市场。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从2012年中买第一个投资房开始,短短两年时间就和合伙人买了25个投资房,并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价格便宜得“离谱”

法拍屋是由于美国的购房者无法支付银行贷款,银行取得“执行名义”后,由法院查封房屋,进而执行拍卖处分。美国的法拍屋有两种,一种产权不清,价格相对便宜;另一种则产权清楚,比如短售(Short Sale)和银行屋(REO)。而李明买的都是后者。后者法拍屋的拍卖大都采取买方暗盘竞标,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能支付最高价者获得。

谈起买卖法拍屋的成功经验,他说主要有三条,一是他和合伙人一起干,经验多,风险低,投资可以多元化。二是主要合伙人都是有扎实的金融投资理论和长期投资经验,三是对美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比较熟悉。

和李明聊天,他描述自己的家庭理财观是“谨小慎微”。此前他把

金融城传真

央行行长的周年成绩单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到7月份,有着“银行界的克鲁尼”之称的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已经履任整整一年。作为擅长念经的外国和尚,这位加拿大人总算没给英格兰银行300多年历史上首任外籍行长的名头抹黑,拿出了一份不输他相貌的帅气成绩单。

一年前卡尼上任之初,整个金融城都在用一种好奇、期待以及包含近乎挑剔的目光审视这个四十多岁的外乡人。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从加南大央行跳槽过来的卡尼配不上每年87.4万英镑的薪酬,毕竟这一待遇不但在全球央行界首屈一指,甚至要比卡尼的“大老板”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工资高出五倍多。

但事实证明付给卡尼工资里的每一个英镑都是物有所值。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工业产值在今年4月实现了三年来的最高速增长,表明英国经济增长强劲。在这种情下英格兰银行果断提高了对明年英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表示英国经济“开始回归正常状态”。

华尔街夜话

就业向好为何拉不动美国经济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7月21日,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贾森·弗曼在世界银行讲座时表示,与金融危机最严重时10%的失业率相比,目前全美失业率降至6.1%,美国整体就业形势已恢复83%。美国短期失业水平(失业期6周以内)甚至已经好于危机前平均水平,而长期失业水平则恢复了72%。弗曼因此认为“美国就业市场复苏已经走上正轨,尽管还没有完成”。

与此同时,美国劳工部也在月初公布了一组令人乐观的数据:上半年全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140万个,为1999年以来最快。仅仅在6月一个月,美国非农部门就新增就业岗位28.8万个。失业率显著下降而新的工作岗位迅速增加,如此良好的就业市场形势在过去通常会被解读为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周期的到来,但目前的美国经济却难言看到快速增长的曙光。



新华社图片

大部分家庭投资放在共同基金上,尤其是债券领域,基本上每年都有比较稳健的正回报,即使在金融危机恶化的2008年,他的整个家庭投资亏损也只有2%。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房地产市场遭受重创,房价大幅下跌。李明在纽约附近的热门地区长岛买下了自住房,比高峰时的价格便宜了至少25%。

便宜价买到自住房,也促使李明琢磨起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我当时的判断是,金融危机不仅挤出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甚至还跌过了头,美国的房产简直就是投资的天堂,”李明说。他决定加大房地产投资力度。

2011年年底,在通过对大量美国房地产数据的量化分析后,他发现许多法拍屋的价格大多跌倒了2007年高峰价格的50%,夸张的甚至有二折价。“也就是说,2011年的

许多法拍屋的价格回到了十年前的价格。不仅没有泡沫,而且便宜到了离谱的地步。”

在对市场进行详尽分析研究后,作为一名金融专业人士,他还得出了对宏观经济的看法:美国经济和房地产开始有复苏迹象,欧洲危机有恶化趋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用一句话总结:“美国开始好转,欧洲要做最坏的打算,中国经济还有困难。”

农村包围城市

李明针对自己和合伙人的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制定了一套投资战略、投资方案和具体实施措施。当时他制定的投资战略核心是:进入美国法拍屋市场,以获取好的租金收益和长期房产升值。以现金买入为主,不要杠杆借贷,稳中求进。

投资方案主要涉及到挑选投资区域和如何分配投资资金。首先是

挑选区域,在纽约州周围,李明决定避开大部分华人投资者热衷的纽约市内的几个地方,比如曼哈顿、法拉盛等,转而选择了距离纽约1个多小时车程的康涅狄格州(康州)。他给这个策略起了个名字,叫“农村包围城市”。

由于受语言和其他限制,许多华人投资者只能在华人多的地方买房子。对于李明及其合伙人来说,他们有和美国主流社会打交道的能力和经验。知己知彼、扬长避短是投资方案的核心考虑。

康州位于纽约和波士顿两个经济和文化中心之间,是美国传统上的“老钱”聚集地,有许多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受金融危机影响,康州的金融行业受到严重打击,导致康州房价大跳水。

李明规划了一个“三点一线”的方案。三点是康州的三个城市:斯坦福市(Stamford)和其他两个城市。这三个城市都是位于康州黄金东海岸,基本上在95号高速公路的直线上。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既方便集中管理,又兼顾租金收入和地产升值。

至于如何分配投资资金。他当时的策略是:以斯坦福市的低价位的公寓和多家家庭别墅为主要目标,以其他两个城市的中等偏低价位的多家庭别墅为次要目标。

投资回报可观

2012年中期,李明和合伙人选中了位于康州商业及金融中心的斯坦福市(Stamford)的一座又大又新的三家体的别墅。他们花40万美元买入,又花了5万美元装修,当年年底以60万卖出,半年获利25%以上。

李明介绍说,在法拍屋的过程中,需要和银行、律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和本地政府打交道。而他自己的优势是,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对美国社会有充分了解,和方方面面打交道都游刃有余。

他举例说,有一套房买了之后装修动静比较大,被邻居投诉,需要当地政府对改装安全进行审批。李明聘请的建筑商是一家当地人经营的公司。通过与政府积极沟通,最后这个房屋的改装获得“免审”。

李明最初给自己和合伙人定的目标是,每年买一套房,10年后可以累积买10套房。不过在经历几笔交易后,他发现2012年的康州法拍屋市场简直就是“拓荒期的美国西部大草原”,任人驰骋。于是他的投资计划也大大提前。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李明和合伙人买了25栋投资房,房屋交易总金额高达800万美元以上。房屋类型几乎涵盖所有中小型房地产投资品种,包括独立家庭别墅、多家庭别墅、公寓等。目前大部分房子用于长期投资,也有小部分用于短期转手买卖。

由于法拍屋的可观回报,李明和合伙人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有专人负责法律事务,还有人负责房屋后期的出租和维护。现在他们正在积极帮助中国投资人到美国进行房地产投资。

谈到今后美国房地产走势,李明说:“现在美国经济和房地产已开始全面复苏,自从2012年开始,许多地区的房地产价格都有大幅增长。现在美国房地产的上涨趋势十分明显。根据过往历史,房地产每十年是一个周期。现在正是地产价格开始起飞的阶段。”

海外选粹

美国经济魅力渐失

回首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形势曾一片大好:一方面国内生产力突飞猛进,另一方面移民及外国资本纷纷涌入,共同借力所谓“新经济”。彼时,美国失业率跌至4%的历史低点,同时通胀率也保持相对稳定。基于此,众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突破数十年来的3%的平均数值,达到3.5%甚至更高。

遗憾的是,新经济早已风光不再,而随着2008-2009年经济衰退的不期而至,美国开始缓慢的经济复苏历程。近五年来,各路经济学家可谓见证了战后美国经济最低速期,且越来越多的经济数据表明,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且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劳动力供给及生产率情况更呈双降态势,这一问题在过去一年里尤显突出。鉴于此,国际货币基金

美国正面临适龄劳动人口降低的风险:1990年代,美国适龄劳动人口以年均1.2%的比率增长,2013年这一比率仅为0.4%。而经过数年经济衰退,很多失业人口早已放弃就业打算,也间接造成适龄劳动人口增长放缓的现状。而在适龄劳动人口增长放缓的同时,美国接近及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口数量则增长迅猛,从而使得美国劳动力供给形势更趋严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颇为苛刻的移民政策也在影响着对适龄劳动力的引入,而奥巴马总统力推的医改计划更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一部分劳动人口的惰性。

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



《经济学人》

组织最近将美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调低至2%,更有经济学家看低至1.75%。由于2008年以来的经济衰退影响之大,虽然从目前来看,美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并未对经济发展造成实质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率受限将会带来可怕后果,包括居民生活水平增长放缓、税收收入降低及债务负担加重等。

《经济学人》杂志认为,解决短期经济增长问题的主要手段无外乎刺激需求增长,因此美联储应力图保持低利率水平。但寻求长期经济增长还需从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生产率方面入手。

劳动力供给方面,如今

个金融城都对英格兰银行何时升息翘首以待。卡尼则在出席金融城市长主持的晚宴时称提高利率的时间可能会比市场预期得要早,但是上调的幅度将会很小,会是一个逐渐增长的过程。

而升息对卡尼来说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烦恼。因为如果从目前历史超低点上提高利率,可能会影响英国的房地产市场,并增加房贷主偿还房贷的负担,另一方面英国不断升温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在酝酿新一轮泡沫。

在升息问题上卡尼几次释放出含糊不清的信号,英国议员指责其行像“一个靠不住的男朋友,前一分钟还热乎,后一分钟就冷淡。”还有人称卡尼“给出了很多指引”但是“却指的不是同一个方向”。不过其实比起从格林斯潘到伯南克在解释美联储政策时含糊不清的微言大义,或许能把卡尼的言论理解为身上尚存一些“北美特色”。

这种特色还不足以影响卡尼的周年成绩单,可在矛盾信息的背后,英格兰银行究竟何时采取升息行动,是接下来一年中对卡尼最大的考验。

事实上,测量一国潜在增长率是很困难的,因为短期需求和长期供给难以区别开来,因为前者会影响后者,当短期需求大幅增加时,企业就会增加投资和加大创新力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长期供给,反之亦然。

不过距离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已经有近6个年头,这6年被认为是美国二战后经济复苏最缓慢的时期,这让不少经济学家和机构认为,仅仅靠短期需求难以拉动美国经济,必须增加长期供给。弗曼强调,美国应当学习其他国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学前教育投入等方面的经验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促进经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也提出了类似建议,认为美国政府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教育投入,改善现有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推动移民改革、提高最低工资,以应对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的态势。

不过,上述任何一项改革对美国现有的经济政策而言都意味着大动干戈,都需要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合作,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超高的政治手腕。而如今华盛顿国会分治、中期选举临近,这些举措的出台都遥遥无期,这也意味着美国经济低速增长态势还将持续。

愿违,当经济生产率提高而得到改善,反而比2007年经济危机前有所下降。《经济学人》杂志分析认为,这与科技创新生产率低效应的滞后效应有关,而经济复苏过缓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外,美国政府还应在投资方面有所作为:包括大力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降低高不可攀的企业税率以防止大牌企业为避税而逃离美国。除此外,美国政府还应有效推动移民改革,以吸引适龄劳动人口,并放松管制,促进企业在美投资,同时阻止美联储过快升息,以挽救美国经济之颓势。(石璐)